

黄德宽

陈秉新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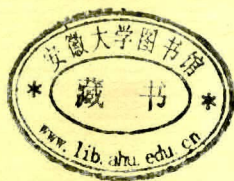
汉语文字学史

增订本

安徽教育出版社

汉语文字学史

【增订本】



黄德宽
陈秉新
著



安徽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语文字学史 / 黄德宽, 陈秉新著. —2版(增订本).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6
ISBN 7-5336-4785-8

I. 汉... II. ①黄... ②陈... III. 汉字—文字学—
汉语史 IV. H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086967号

责任编辑: 姚莉

装帧设计: 马芳

技术编辑: 吴丽君

出版发行: 安徽教育出版社(合肥市回龙桥路1号)

网 址: <http://www.ahep.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排 版: 安徽飞腾彩色制版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合肥远东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21.25

字 数: 380 000

版 次: 2006年8月第2版 2006年8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2 500

定 价: 39.00元

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 话: (0551)2822632

邮 编: 230063

增订本前言

《汉语文字学史》书稿完成于1989年5月,1990年底出版。初版时激光照排刚引进出版社不久,对古文字和生僻字的处理还没有太好的办法。我和请来帮忙的朋友,在安徽教育出版社的照排室里,摹写字形、校对和挖补胶片,忙碌了一个令人难忘的暑假。但是,初版的校对和印刷质量依然很差。不过,也许这本书的出版正好可应一时之需,同行们没有计较这些技术问题,却对它给予了我们未曾预期的评价。1994年韩国河永三先生来函联系,要将它翻译介绍给韩国读者,使我们有机会做了一次校订工作。十余年来,出版社也几次加印,以满足读者要求。但是,随着激光照排技术的进步和印刷装帧水平的不断提高,再看到这本校对和印刷粗劣的小书时,总是于心不安。尤其是拿到2000年韩国东文选出版社出版的印刷精美的韩文版时,更是觉得初版不宜再印了。

为适应读者需要并反映文字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安徽教育出版社决定出版此书的增订本;同时,安徽教育出版社还与台湾联经出版公司合作,商定将繁体和简体字版在海峡两岸分别出版。这样,不仅使我们有机会将初版中的一些错误逐一进行校改,而且能对本书出版以来文字学研究的新进展有所补充。十余年来,文字学各个领域的研究全面展开,当初我们在撰写本书时处于良好发展态势的战国文字研究,今天已蔚为大观;当时尚较为薄弱的俗字研究,近年来取得突出成果;而现代汉字学的形成和现代汉字研究的进步更是引人注目。凡此等等,都需要及时予以总结和反映。因此,我们觉得有必要增写一章,对近年来的研究进展作一个简要的介绍和初步的评价。除此之外,我们还对初版做了少量必要的文字调整和技术处理。但是,凡涉及内容的则不作大的改动,目的是保持原版的学术真实。尽管随着著者研究的深入和本领域研究的进步,过去对某些问题的认识今天会有所变化。书后所附汉语文字学主要参考书目,既是汉语文字学不同历史时期的代表性著作,也是学习和研究汉语文字学的重要参考书。这次我们对参考书目做了较大调整,增补了近十余年来新发布的资料和新出版的较为重要的论著。



初版时对本书写作的背景和一些考虑未做详细交代。韩文版出版时,应译者之约我写了一篇序文,这篇序文对读者阅读本书也许是有意义的,故将该文全文次列于后,供读者参考。

学术史的研究在世纪之交颇为热闹,这是我们撰写此书时所未曾料想到的。以我等的积累和学识,当时敢写这样一本书,真是有一股“初生牛犊”的莽撞。虽然今天看来这本书还显得非常粗浅,但就个人治学而言,这又实在是一个难得的历练。这项工作使我深切感到,只有了解、尊重前人时贤的学术劳动和贡献,我们才会做到学术的诚实并在已有的研究基础上取得进步,既不自欺欺人,亦不欺于人。本书的增订再版,如果对读者和作者还有些许意义的话,那大概也更在于此吧!

黄德宽

2005年8月于安徽大学



韩文版序

《汉语文字学史》韩文版的出版是一件令我们十分高兴的事情。拙著自中文版问世以来,得到了国内外许多研究者的关注,现在河永三先生又将它翻译介绍给韩国的读者,希望它的出版对热爱中国文化和汉字的韩国读者能有所裨益。

中国汉字有着很悠久的历史,对中国汉字的研究同样源远流长,可是比较全面地总结汉字学历史的著作却很少见。十多年前,我在南京大学读中国文字学研究生,开始了对中国文字学史的思考。遗憾的是,当时能读到的有关这方面的著作,只有本世纪30年代胡朴安所著《中国文字学史》一种。这部书是第一部总结文字学史的专著,它的价值毋庸置疑,它的不足也十分明显。我深感应该有一部新的文字学史,能从更广阔的历史文化背景上揭示中国文字学的发生与发展,能根据文字学的内在体系及其形成演进反映这门学科的历史进程,能以现代科学的眼光评判中国文字学史上的重要现象和成果,尤其是自30年代到80年代近五十年的文字学研究更需要进行全面的总结和反思。撰写这部《汉语文字学史》的愿望,就这样萌发了。由于中国文字学历史跨度长,著作宏富,学者如云,独自一人担此重任是十分困难的。因此,通过几年的资料准备,形成总体构思并开始写作一段时间之后,我的学术上的朋友陈秉新先生应我之邀参与了这一工作。经过一年多的合作,《汉语文字学史》中文版终于刊行。

基于我们对中国文字学的一些思考,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们力求在以下方面有所尝试:首先,我们试图从中国文字学发生、发展的文化背景来认识其历史。作为一种文化学术现象,我们认为文字学的产生和发展,总是与一定时代的历史、文化和学术思想变迁紧密相关的。文字学在汉代创立、魏晋后消沉、清代振兴及近代开拓发展,都有着深刻的历史文化动因,对此我们在书中做了初步的揭示。

其次,在取材方面我们从文字学的基本构架出发,选取最能代表文字学发展的有关内容展示其历史。比如,自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之后,文字学的研究成果总是以“字书”编纂的形式反映出来,这是传统文字学的一个明显的特点。然而“字

书”的概念及其内涵又不仅仅是“文字学”的,因此,本书比较重视传统字书的沿革发展,并从中寻找足以反映其时代文字学研究水平的内容予以讨论,恰切评判“字书”编纂与文字学发展历史的关系,而避免将文字学史写成“字典史”。对汉字的观念及相关政策,也是文字学不可忽视的内容,本书对“书同文”、“汉字改革”的讨论正是从这一点出发的。这本书所涉及的材料和领域,实际代表了我们对文字学基本构成的意见。

其三,在文字学的历史分期方面,我们注重学术发展内在的关系。分期是撰写学术史所面临的最重要的艰巨的任务之一。本书所划分的四个大的历史时期,侧重于学术思想、学术成就以及文字学总体格局的发展,试图将两千年来的中国文字学史作一初步的勾勒,而不是按照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简单化地描述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字学。因此,在本书中没有采用通常所说的“周秦文字学、两汉文字学、魏晋南北朝文字学、唐宋文字学”之类的分期,而是按文字学的“创立—消沉—振兴—拓展”这一演进轨迹来描述其历史面目。这有利于将文字学自身发展的脉络及各种学术流派的因沿更替,更加清晰地呈现出来,同时也便于更准确地揭示文字学发展变化的历史文化原因及其规律性,为当代文字学研究和汉字学习提供借鉴。这种思想也贯穿于我们对不同时期文字学研究具体问题的评价之中。

第四,作为一部文字学通史性质的著作,既要有宏观的把握,做到若网在纲、条理灿然,又要有细致的分析,深入堂奥、探玉寻珠,这是一种比较难以达到的境界。本书虽不敢说能达到这样的境界,但却尽了我们自己的努力。因此,在本书写作和结构方面,我们希望在展示文字学发展的总体面貌的同时,能深入地、有重点地介绍那些最重要的著作和成果,对那些长期被忽视或误解的重要成果,我们更是不惜笔墨。

上述有关内容,在本书中文版问世时没有提及,利用这个机会作一介绍,或许对韩国的读者和朋友阅读本书会有所帮助。现在看来,本书尚有许多不足。例如,对消沉时期的文字学状况介绍得比较简略,对清代以来的碑别字、俗字研究以及当代《说文》学和现代汉字研究的有关方面(如汉字的信息处理)尚没能予以足够重视。此外,由于资料所限,对海外研究汉字的成果介绍得也不够全面。所有这些,希望读者能有所注意。

河永三先生不仅将这部书译介给韩国读者,而且在翻译的过程中对全书还做了认真仔细的校订,是正颇多,谨在此致以深切感谢!

黄德宽

1994年10月识于中国合肥

序

姚孝遂

从事任何学科的研究,都必须了解其整个的发展过程。只有在继承和总结前人研究工作的基础上,积累经验,吸取教训,撷取精华,剔除糟粕,才有可能认识问题的症结所在,不断地有所创新,促进本学科的发展。

关于汉语史的研究,文字学史的研究应该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戴东原曾经深刻地指出:“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辞也,所以成辞者字也。必由其字以通其辞,由辞以通其道,乃可得之。”我们研究古代汉语,是通过历代的有关文字记载来进行的。离开了文字形体的研究,就不可能从事古代语言的研究。尤其是汉字形体结构的复杂性,及其发展变化的复杂性,更加使得汉语文字学在整个汉语语言学中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从历史的实际情况来看,传统的中国文字学是以研究文字形体的发生、发展、演化为主导,而同时又非常紧密地联系到音韵学、训诂学、词汇学等各个方面,形成一个完整的汉语语言学研究体系。然而,在目前的汉语史研究工作中,汉语文字学史的研究,却成为一个非常薄弱的环节,这种状况,应该加以改变。

汉语文字的历史,我们可以上溯到六千年前的半坡文化时期。然而作为一种完整的文字体系,或者说,一种能完全胜任记录语言的文字符号系统,根据目前已经掌握的资料,还只能是三千多年前小屯文化的甲骨文字。应该承认,像小屯殷墟甲骨文字这样成熟而完整的文字体系,不可能是突然地在一夕之间自天而降的。它必然经历了一段长期发展变化过程。虽然目前我们已发现在小屯文化之前的一些零星的所谓“古陶文”资料,以及商代晚期青铜器上的所谓“图形文字”,但这些都只是孤立的文字符号,还不能具有完全胜任记录语言的功能,尚处于文字前期的不成熟阶段。

从殷商的甲骨文直至今天的通行汉字,其形体结构始终处于不断发展变化过程之中。与此同时,人们为了阅读古代典籍文献的需要,也一直在对这些发展变化



的文字形体进行辨识和释读的研究工作。历代的史官,就是职掌这项研究工作的专职人员。

传说周宣王时太史籀作《史籀篇》,书已亡佚,难以稽考。这和黄帝之史仓颉始作书契一样,只能是一种传说。春秋时期楚国的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等古代典籍。孔子整理“六经”,也应该是在精通文字的基础上进行的。

能够辨识、释读古代典籍中的古代文字形体,需要对这些文字形体进行研究和掌握,仅仅这样,还不能称之为文字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应该是对其研究的对象,有一个完整而系统的规律性认识,形成其自身的理论体系。汉语文字学的理论体系究竟在什么时候具备的呢?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深入探讨的问题。

《周礼》保氏教国子以“六艺”,“六艺”之一有“六书”。根据郑众的解释,“六书”即“象形、会意、转注、处事、假借、谐声”。这种解释缺乏根据,是值得怀疑的。任何理论体系的建立,都只能是在全面、深入地研究客观实际,并总结对这些客观实际内在规律性认识的基础上形成的。不仅是西周,即使是春秋、战国时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在当时曾经对文字形体进行过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和探索,因而也就没有形成有关理论体系的可能。

西汉初年,革秦之弊,废藏书之禁,民间藏书得重见天日。尤其是孔子壁中书的被发现,极大地丰富了可供研究的资料。加上当时推崇学术,广立博士之官,有力地促进了有关研究工作的开展。孔安国、张敞、扬雄、司马相如等著名学者,都应该是这项研究工作的积极参加者和推动者。值得特别加以提到的是:刘向、刘歆父子,校中秘藏书,花费了毕生的精力。他们在各个学术领域都取得了广泛而精深的成就。可惜的是,流传到现在的,仅有《别录》和《七略》可以算是专门的学术著作。但是,大量的先秦典籍是经过他们的整理和校订,才得以保存和流传的。在他们整理和研究古代典籍的工作过程中,必然曾经对不同时期的文字形体的发展变化过程,做过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否则,他们将无法整理和校订如此大量的古代典籍。当然,这仅仅是一种推论。可是我个人深信,这种推论是合理的,是符合客观实际的。从班固和贾逵等都与刘歆有着非常密切的学术渊源这一点,可以得到比较充分的证明。

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最早的有关“六书”的具体名称,是班固《汉书·艺文志》所罗列的“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这和上面所提到的郑众所注《周礼》大同小异。班固《汉书·艺文志》本之于刘歆的《七略》,而郑众的父亲郑兴乃是刘歆的弟子。这些现象绝不是一种偶然的巧合。

再进一步来看,许慎是贾逵的弟子,而贾逵的父亲贾徽也是刘歆的弟子。古代学术讲究师承,均有其渊源关系,这样问题就非常清楚,所有关于“六书”的说法,都是一个来源,都可以上溯到刘歆。

现在我们所能见到最早的、利用“六书”理论全面系统地分析文字形体的专门著作是许慎的《说文解字》。这部书博采通人,保存了大量的前期有关文字的研究成果。由于有了《说文解字》这部书,使我们得以了解早期文字学的系统而完整的科学体系。我们必须承认,许慎的《说文解字》在汉语文字学史上具有无比的权威性,在将近两千年的时间里,一直被奉为经典,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

毋庸置疑,许慎的《说文解字》在汉语文字学方面的成就和贡献,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一部著作可以与之相比拟。但是,人们对于客观事物的认识,永远不会停留在已有的水平上。任何一门学科,都会继续不断地向前发展,永远不会终结。否则,这门学科将失去其应有的生命力。

长期以来,许慎的《说文解字》在汉语文字学的研究工作中,一直被奉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经典。其所有的见解和结论,全都作为进行有关论证的依据和出发点。这是一种极不正常的现象,然而却普遍地被认为理所当然。直至目前为止,这种状况并没有在根本上得到改变。

任何事物总不会是那么完全一致的,任何人对于客观事物的认识也是如此。在汉语文字学史的发展过程中,曾经有人对“六书”的理论和某些文字的解释提出了与许慎不同的见解。其中比较突出的有:唐代的李阳冰,他曾经对《说文解字》中有关文字形体的解释提出过很多疑义。他的许多见解保存在徐锴的《说文系传》的《祛妄篇》中。李阳冰的最大特点在于:从文字形体的客观实际出发,敢于向传统的权威结论提出挑战。现在看起来,其中有很多疑义是有根据的,有很多新义是值得肯定的。宋代郑樵在“六书”理论方面有所突破,提出了他自己独到的见解,力图超越传统思想的樊篱。其早期的著作《象类》现已不可得见。可以肯定的是,《象类》的内容已包括在《通志·六书略》之中。郑樵的文字学理论,现在看起来不免有些幼稚,然而却是新颖而独到的。任何新生的事物,在其发生的阶段,都不可避免地显得有些幼稚,这是情理之常,丝毫不足为怪。令人遗憾的是,郑樵所需要研究和整理的范围过于广博,他没有能够在文字学方面作进一步的探讨,从而使他的文字学理论得到进一步的发挥和完善。尤其令人感到遗憾的是,郑樵关于文字形体结构的一些具有启发性的见解,一直未能得到足够的重视,这既是长期以来传统思想束缚的结果,也是失去一个突破传统思想大好良机的原因。

宋代金石学的兴起,为人们提供了大量有关文字学的新资料,同时也为人们突

破传统思想的束缚提供了一个机会和可能。但是,由于人们对这些新的资料研究得不够深入和系统,因而成就非常有限。

元代戴侗作《六书故》,周伯琦作《说文字原》、《六书正讹》,都曾利用新的文字资料,纠正了许多传统的错误见解。然而他们却因此受到了非议,被认为是离经叛道,遭到排斥。同时,他们也未能在已取得成就的基础上进一步形成新的理论体系。

清代汉学复兴,考据之学盛极一时。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钱大昕等以其广博的学识和坚实的基础,将文字、声韵、训诂之学推向一个新的顶峰,而其基础和先导就是文字学。可惜的是,这些学者都没有能够利用新的文字资料,甚至都对新的文字资料抱着漠视以至怀疑的态度。这样就不仅使他们的成就受到很大的局限,同时也使得他们陷入传统思想的窠臼而不能自拔。他们只不过是传统的认识加以维护和丰富,而未能加以突破和发展。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乾嘉以后的学者如王筠和徐灏等,能够利用一些新的文字资料,具有独到的见解,富有新意,给人以启迪。任何学科的发展,都需要有新资料的补充,并开拓新的领域。汉语文字学也不能例外。地下文字资料的不断大量出土,这些都是许慎所未及能见的。这些资料不仅丰富了人们的认识,而且也不能不对旧有的说解提出挑战。自李阳冰、郑樵开始,就曾经利用了这些新的资料,尽管是十分有限的。到了清代末叶,吴大澂、孙诒让等,更是对新的文字资料做了大量的整理和研究工作,并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尤其是殷墟甲骨文字的出土,为汉语文字学的发展,提供了无限广阔的前景。

在新的事物面前,人们往往抱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种是采取积极的态度,给予足够的重视,认真地加以研究和探索;另一种则是采取漠视和怀疑的消极态度,加以拒绝和排斥。

例如,在语言、文字方面有着卓越成就和巨大贡献的学者章太炎和黄季刚,就对《说文解字》所未载的商周文字抱着怀疑的轻蔑的态度,断然否认其真实性而加以摒弃。这样就不可避免地限制了他们的成就。如果说,乾嘉时期的那些大师们未能认识到这一点还情有可原,到了20世纪仍然如此固执,则只能是一种偏见了。章太炎到了晚年,开始意识到自己在这方面认识上的错误,但已悔之晚矣。

20世纪兴起的中国古文字学,实际上就是汉语文字学的深入和发展。由于古文字学跨越了语言学的领域,与历史学、考古学等紧密地发生了联系,形成了一门独立的边缘学科,由此似乎导致了一种不应有的倾向:汉语文字学轻易地放弃了殷商两周古文字这一领域,不能深入加以涉及。甚至许多有关文字学的著作,还是以



《说文解字》为依据,来谈论文字的本形、本音和本义。

汉语文字学的研究对象,应该是全部已经掌握的汉字形体。商周古文字不应该是古文字学的禁脔。不同的学科可以在研究的手段、方法、方向、重点上有所不同,但是,这并不能排斥不同的学科有着共同的研究对象。我个人认为,汉语文字学不应满足于简单地利用一点点古文字资料,而必须像对待其他文字形体一样,广泛而深入地探讨所有古文字形体的发生、发展和变化规律,从而在理论性的认识上有一个新的突破。

本书著者多年来在文字学和古文字学方面潜心钻研,并且经过严格而系统的锻炼,其所论述,多有创获。《汉语文字学史》一书,系统地总结了我国历代文字学的研究发展过程,并表达了著者在这方面的独到见解。这对于当前和今后汉语文字学研究工作的进一步开展,将是有所裨益的。在《汉语文字学史》行将出版之际,不揣鄙陋,略陈管见,就正方家。

1988年除夕识于长春

引言

汉语文字学萌芽于周秦，创立于两汉，经历代的发展、完善，逐渐成为中国传统语文学和现代语言学的重要分支。作为中国传统语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的汉语文字学，其历史悠久，著作宏富，在中国学术史上占有相当显著的地位，是一份十分宝贵的遗产；作为现代语言学一个重要分支的汉语文字学，它今天仍有其生命力，并面临着科学技术现代化所提出的一系列的全新课题。因而，反省汉语文字学的历史，总结这门学科发展的规律，对继承文化传统，推进文字学研究，是一件颇有意义的工作。

我们认为汉语文字学的发展历史，可以划分为四个大的时期：创立时期（周秦—两汉）、消沉时期（魏晋—元明）、振兴时期（清代）、拓展时期（近代以来）。

文字学的创立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孕育过程，周秦典籍中存留的汉字分析、《周礼》所说的“六书”以及“仓颉作书”的传说和“书同文”的记载，都是汉语文字学萌芽时期的产物，《史籀篇》、《仓颉篇》等早期字书出现，更能显示这棵幼芽的破土欲出之势。汉代文化的复兴和经学的兴起，则为汉语文字学的创立提供了丰厚的文化土壤，文字训诂之学随着文化经典的整理和经学今古文的论争，获得了一个充分发展的时机。在这种背景下，产生了《说文解字》（简称《说文》）这部文字学史上影响深远的巨著。它的出现表明汉语文字学的正式创立。魏晋至元明的文字学，主要是因沿两汉学者开辟的研究途径缓慢推进。这一时期编纂出的各类不同的字书，受到《说文》的明显启发，甚至直接模仿《说文》。字书的发展及其反映的水准代表了这一时期文字学研究和发展的水平，是文字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除承袭《说文》出现了李阳冰、徐铉、徐锴等《说文》学者外，唐代的字样之学、宋代的金石学和宋元的“六书”研究，也给这一时期的文字学带来某些突破，但是，从总体上看，并未能根本改变文字学研究的消沉局面。清代是文字学的振兴时期，《说文》学经长期的发展到清代盛极一时，产生了以段、桂、王、朱等四大家为代表的一大批《说文》学者，以《说文》为主体的传统文字学发展到巅峰。宋代开创的金石学，经元明的消沉，到



清代也得以复兴。晚清孙诒让、吴大澂等人的金文研究,突破了《说文》学的藩篱,使古文字学最终从金石学中分立出来,成为文字学的分支。近代汉语文字学跨入拓展时期,19世纪末甲骨文的发现,为古文字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契机。20世纪各种古文字资料的大量出土,开拓了古文字学研究的领域,甲骨文、金文、战国文字及秦系文字的研究相继兴起,形成古文字学研究的几个重要分支。古文字学的进展是近代以来汉语文字学最重要的成就。西方学术文化的影响,推动了近代汉语文字学理论的探索和体系的建构。清末以来规模盛大、历时漫长的汉字改革运动,是文字学史上最引人注目的事件,对现行汉字体系的整理和研究,是汉字改革运动带来的文字学研究的重大转变。近代以来的汉语文字学研究领域得到了很大的开拓,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它获得了多方面的进展。

本书以这四个大的历史时期为经,分为四编,勾画出汉语文字学两千余年发展演进的总体脉络。在每编之始,先简略介绍这一时期的历史文化背景,再以文字学史上的重要问题为纬,展现不同时代汉语文字学的具体面貌。近代以来的汉语文字学则是我们阐述的重点。

汉语文字学与音韵学、训诂学有着密切关系。汉字是一种自源的文字体系,与汉语的关系密不可分。在传统小学中,文字学与音韵学、训诂学既鼎足而立,又相互渗透,便是这种密切关系的反映。文字学研究,离不开音韵、训诂,王念孙为《说文解字注》作序时曾说:“《说文》之为书,以文字而兼声音、训诂者也。”历代治文字学者莫不兼治音韵、训诂之学。音韵学、训诂学的发展推动了文字学研究的不断深入,文字学研究的深入又促进音韵学、训诂学的不断发展。清代学者在小学方面之所以成就卓著,就在于研究过程中能将三者密切结合起来。由于汉字与汉语的这种密切关系,传统文字学与语言学的界限分得并非十分清楚。近代以后的文字学者在提倡形、音、义综合研究时,仍存在将文字学、音韵学和训诂学三门兼收并蓄的现象。

汉语文字学是一门富有突出的民族特色的学科。汉字体系是世界上来源最古老的文字体系之一,几千年来延续不断,未有发生根本的改变。汉语文字学以汉字为研究对象,深植于民族语言文字的沃土之中,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专门学科。地下出土和传世的历代文字资料,异常丰富生动地展现出汉字不同时代的形态风貌,为汉语文字学的发展提供了优越的条件。汉语文字学基本理论、方法的形成,是历代语言文字学者长期摸索和积累的结果,是前人留下的宝贵财富,是民族文化传统的精华。

汉语文字学是一门实用性很强的学科。古代典籍的整理、研究和经学的沿革

发展,与文字学的发展始终休戚相关。传统文字学依附经学,“明经致用”,注重文字个体形、音、义的阐释,致力于本字本义的推求,都与讲求实用有一定关系。直到近代以后,这种状况才得以改变,真正进入到开拓研究领域、进行理论体系建设的新时期。即便如此,理论的研究仍是文字学的薄弱环节。当代的汉语文字学既要发扬其讲求实用的优良传统,以适应社会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发展的需要,又要加强基本理论的研究,以便在前人的基础上将这门历史悠久的学科推向一个新的、更高的发展阶段。



目 录

增订本前言	006
韩文版序	008
序	010
引言	015
 第一编 文字学的创立时期(周秦一两汉)	 001
第一章 文字学的萌芽	003
一 周秦的汉字分析与《周礼》“六书” [004]	
二 仓颉作书——汉字起源的传说和猜想 [005]	
三 汉字的早期整理——书同文 [007]	
四 文字书的雏形——《仓颉篇》及其他 [009]	
第二章 文字学的创立	013
一 文字学创立的历史文化原因 [013]	
二 汉代文字学概况 [016]	
三 许慎与《说文解字》 [018]	
 第二编 文字学的消沉时期(魏晋一元明)	 037
第一章 从《说文》到字书的编纂(上)	040
一 魏晋南北朝时期《说文》系字书 [041]	
二 宋明时期《说文》系字书 [051]	
三 《说文》系字书的殿军:《康熙字典》 [057]	



第二章 从《说文》到字书的编纂(下) 061

- 一 辨正文字之字书 [061]
- 二 古文字书 [073]
- 三 俗文杂字字书 [078]

第三章 《说文》的传承和突破 080

- 一 李阳冰与《说文》 [080]
- 二 二徐对《说文》的校订与研究 [084]
- 三 《字说》与“右文说” [089]
- 四 郑樵等人的“六书”研究 [092]
- 五 宋代的金石学 [096]

第三编 文字学的振兴时期(清代) 103

第一章 清代的《说文》学 106

- 一 清代《说文》研究之概况 [106]
- 二 清代《说文》学四大家 [107]
- 三 “六书”理论的进展 [120]
- 四 “字原”的探究 [126]
- 五 清代《说文》学在文字学史上的地位 [129]

第二章 金石学的复兴和古文字学的分立 130

- 一 金石学与古文字学之关系 [130]
- 二 清代金石学发展概况 [131]
- 三 吴大澂、孙诒让诸家对古文字学的贡献 [133]
- 四 古文字学的分立及其意义 [142]